

百年国士

九五夔夔
延龍題

自述·回忆·专访

王大鹏 / 选编 丁聪 / 绘画

酒旗风暖少年狂
风号大树中天立
楚天辽阔一诗人
千秋付与如椽笔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90201033

百年国士

自述·回忆·专访

王大鹏 / 选编 丁 聪 / 绘画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九五叟 顧廷龍題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国土/王大鹏选编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
1998

ISBN 7-5059-3247-0

I. 百… II. 王… III. 文化—名人—生平事迹 中国 IV.
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8)第39215号

书 名	百年国土(全四册)
选 编	王大鹏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10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谷守女
责任校对	甘星光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河北省徐水县新兴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600千字
印 张	67
插 页	8
版 次	199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3247-0/I·2458
全套定价	108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

酒旗风暖少年狂
风号大树中天立
楚天辽阔一诗人
千秋付与如椽笔

花溪高下綠舟載
笑歌輕偶效川江楫
忽傳號子聲

重慶南溫泉
襟詠之一

大鵬同志雅令

一九八零年夏葉聖陶



芳物逢搖落
姮娥耐九秋
綉衣人不見
獨

上寺南樓
蘇曼殊詩應

大鵬全志屬書

平伯



清脫披衣尋杖藜
隔牆已見最繁枝
老人
空計酬情煮酒
在就寒光讀楚辭
秋意未開
涼如水
見香山
醉似沈因臥
如聽呼不起
冷吹
松竹兩淒淒

東坡在秀州詩

題景不龍坡文室

為天地立志為生民
立命為去聖繼絕學
為萬世開太平

季羨林



一九九八年
十月

序 一

季羨林

在人类历史上，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。中华文化，博大精深，历史悠久，可谓独特中之最独特者。此乃世人之公言，非我一人之私言也。

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，在共时方面，它一定会向四周传播，无远弗届。在历时方面，它一定会代代传承，永不停止。

关于前者，我们先暂时不谈，而只谈后者。文化传承的方式或者手段，不出以下诸端：首先是通过经典文献，把人类的发明创造用文字记录下来，传诸后世。人类抒发感情而创作的诗歌等文学形式，也用文字记载下来，以传诸后世。其次是通过绘画、雕塑、建筑、音乐等等，世袭罔替，一代传至一代。中国的长城、埃及的金字塔等等是最著名的例子。在中国，除了绘画之外，还有书法，这几乎是中国所特有的。至于联合国规定的如泰山之类的文化名胜，并不是人类的创造，与长城等不能混为一谈。

最后一个传承文化的工具，就是人类本身。我个人的看法

是，几乎人人在这里都有份儿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绝对悬殊的。芸芸众生，在自己的思想中，行动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传承文化的意味；但是传承量微不足道。在这里，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极少数的特立独行之士，他们身上的文化传承量是相当大的。本书所谓的“国土”，就是这样的人。“国土”一词儿，古已有之。《史记》中说：“若韩信者，国土无双”。以后历代使用不辍。其涵义一顾名就可以理解。《辞源》中说：“一国之内所共推为才上也。”陈寅恪先生在“王观堂先生挽词”的“序”中说：“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，为此文化所化之人，必感苦痛，其表现此文化之量愈宏，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；迨既达极浑之度，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。”寅恪先生在这里讲的是王国维先生，所以非提到自杀不行。其实传承一种文化“国土”，不一定人人要自杀。反而是不自杀者更多更多，其传承的作用也起得更大更大，自杀者，不得已而为之者也。即使在一种文化衰落之时，我们也并不提倡自杀。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，不也是一种好办法吗？

我在上面提到了文化传承的手段或工具，最后归结到人身上。这是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，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臆断。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，可以为证。即以近百年的历史而论，又何尝不是这样？本书的编者王大鹏教授，根据自己独特的看法，从过去一百年中选出了近 50 名“国土”，编成了这一本书。他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说法，认为这些人都是为“此文化（指中国文化——羡林注）所化之人”。根据我的补充说法，“为此文化所化之人”就是能传承此文化的人。我认为，我们俩的说法并没有任何矛盾之处。

再进一步言之，大鹏先生所选出的这近 50 名“国土”是否

都够格，都恰当，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的，我个人就不完全同意。这是很自然的现象，用不着大惊小怪。就连我们的关于文化传承的看法，也必然会有不同的意见，这同样是很自然的。但是，我觉得，这些“国士”们大体上能够得上传承文化的水平。

就我个人来说，我虽然同意大鹏先生的想法和做法，认为这很独特，很有意义，又蒙他垂青，索序于我，我已应命写成；但是，他把我也列入“国士”之中，即使我再狂妄，我哪里够得上什么“国士”呢？我实在是非常惶恐不安。但我想到，在中国学术史和文学史上，所有的什么“贤”，什么“子”，比如“竹林七贤”、“建安七子”之类的名单，都是良莠不齐的。数在近 50 名“国士”中，何不也让它良莠不齐呢？于是我不再抗争，滥竽其中，敬陪末座。

1998 年 10 月 6 日

序 二

杨 义

人性好奇，这话是有点道理的。没有好奇心的生命，大概已是一种苍老的生命了。宋朝的苏东坡被贬官黄州的时候，常常和客人说笑打趣，还强人说鬼，有推辞者，他就说：“姑妄言之。”贬官的挫折，是容易使人两鬓成霜的，苏东坡在这里以好奇心拒绝生命的苍老。进一步推想，这则掌故岂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，透露了他在黄州贬所还能写出生命力充沛的前后《赤壁赋》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的某种精神秘密？

二十世纪末期的人们躬逢极好的历史机遇，可以大畅好奇心。因为当他们回眸百年的时候，就可以发现在古今社会转型、东西文化冲突的地平线上，曾经行动着一批批想把握历史命运，或受历史命运捉弄的大师名士、奇人怪杰。他们许多奇事轶闻，往往在令人深思之时也令人解颐，生命之火为之一旺。王大鹏先生编集的四卷《百年国士》，囊括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文化界的巨子名流四十八人，上自辜鸿铭、蔡元培、章太炎、张伯苓、于右任，中经陈独秀、鲁迅、熊十力、陈寅恪、胡

话、钱穆，下逮傅斯年、罗家伦、成舍我、张大千、巴金。这些广泛搜罗于海内外书刊的自传、回忆和琐谈文字，颇有一些熔奇事、奇智、奇趣于一炉的笔墨，也许可以使人们从文化人型上去领略一部充满生命趣味的文化史的。

文化史既存在着思想演进的逻辑，也存在着思想者的生命感觉，杂传杂录之所以能够与正史并存不废，就在于经过披沙拣金，可以发现其间有闪光的生命感觉。鲁迅说过：“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，挟恩怨，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，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。”也就是说，此类文字是要以理性加悟性去阅读的。

比如，罗家伦在《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》一文中回忆道：“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聚合的场所。一个是汉花园北大一院二层楼上国文教员休息室，如钱玄同等人，是时常在这个地方的。另外一个地方是一层的图书馆主任室（即李大钊的房子），这是一个另外的聚合场所。在这两个地方，无师生之别，也没有客气及礼节等一套，大家到来大家就辩，大家提出问题来大家互相问难。大约每天到了下午三时以后，这两个房间人是满的。所以当时大家称二层楼这个房子为‘群言堂’（取‘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’语），而在房子中的多半是南方人。一层楼那座房子，则称之为‘饱无堂’（取‘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’语），而在这个房子中则以北方人为主体的（李大钊本人是北方人。按：‘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’，是顾亭林批评北方人的；‘群居终日，无所用心’，是他批评南方人的话）。这两个房子里面，当时确是充满学术自由的空气。大家都是持一种处士横议的态度。谈天的时候，也没有时间的观念。有时从‘饱无堂’出来，走到‘群言堂’，或者从‘群言堂’出来走到‘饱无堂’，总以讨论

尽兴为止。‘饱无堂’还有一种好处，因为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，所以每逢图书馆的新书到时，他们可以首先看到，而这些新书遂成为讨论之资料。当时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从这两个地方讨论出来的，对于旧社会制度和旧思想的搏击也产生于这两个地方。”虽然这里的结论有当事人只见树木、未见森林之嫌，但它对蔡元培治校“循‘思想自由’原则，取兼容并包主义”，终而收孕育新思潮之功，作了富有生命感的注解。而且当事者取顾亭林“群言”、“饱无”之语自嘲，也显示了一种生命自信的诙谐。

中国史籍喜欢借奇人奇事，去蕴含某种精神意义的内核，遂使这种精神内核入人心至深。如《史记》写张良之“圯桥纳履”，葡相如之“完璧归赵”，《晋书》写淝水之战的“谢展折齿”，读来都脍炙人口。近代名流奇事，往往在狂傲中含有天真的生命趣味。比如袁宙宗的《章炳麟渊博怪诞》，写有一则“撒尿对骂当场拜师”：

章太炎在日本编《民报》之余，颇有余闲。一夜正在寓所写文章，忽闻窗外飒飒之音如瀑布下泻，一股腥臊的尿味足令人发呕。章太炎即时怒火中烧，开门大骂“王八蛋，没娘养的，不去厕所，随处撒尿”！楼上一位青年也报之以骂，彼此互不相让，几乎动起武来。邻居前来劝解，大家通过姓名。楼上青年才知道是鼎鼎大名的章太炎，赶快道歉，并愿拜在门下折节称弟子。这就是年方二十的黄侃。后来章太炎说：“余适难居东，季刚（黄侃之字）始从余学，年逾冠耳，所为文辞，已渊懿非凡俗。因授小学经说，时亦赋诗唱和。”他因为给季刚讲课，遂设“国学讲习会”于《民报》社……

两位国学大师的撒尿对骂的奇遇，使他们的名士派头和狂傲脾气跃然纸上，随之却是当场拜师，便在戏剧化中包含着天真。这则掌故如若属实，当为学术史描述他们的师承渊源之时，在他们古老的学术语言之旁提供一种绘声绘色的生命阐释的可能性。

我常想，文化史和文学史是一种精神生命的行程，何必把它们写得味同嚼蜡？嚼蜡是嚼不出生命的滋味的。因此，文学、文化史是不回避那些查有实据、倍见精神的艺林佳话、或文坛掌故的。问题是你要博览精研，能够以出色的理性和悟性，看出佳话掌故背后的精神文化意义，使人在一晒读之后别有会心。比如我著《中国新文学图志》之时，曾用过邵洵美绘赠徐志摩、陆小曼婚礼的茶壶茶杯图，旁边配有几句似诗非诗的话：“一个茶壶，一个茶杯；一个志摩，一个小曼。”当时只不过感到邵氏的逗趣过于甜腻，有失庸俗而已。当看到从海外刊物收集来的罗家伦《回忆辜鸿铭先生》一文之后，才知道此图此语别有深意。罗文说：

当时在他们旧式社会里，逛妓院与娶姨太太并不认为是不正当的事，所以辜先生还有一个日本籍的姨太太。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，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：“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，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？”这个譬喻早已传诵一时，但其本质确是一种诡辩。不料以后还有因此而连带发生的一个引申的譬喻，陆小曼同徐志摩结婚以后，她怕徐志摩再同别人谈恋爱，所以对志摩说：“志摩！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借口，你要知道，你不是我的茶壶，乃是我的牙刷。茶壶可以公开用的，牙刷是不能公开用的！”

如果把这个掌故和邵氏的图画相参照，我们便不觉邵氏的浅薄，反而会反省徐志摩的浪漫作风，以及徐、陆缔缘后他的诗文趣味的变化和转向了。

由于许多回忆文字，是人物谢世之后由他的朋友或学生写成，岁月早已使人物蒙上烟尘，所余者只是他极为独特、且给人深刻印象的言行。这就使某些奇人奇语中包含着奇智，可使读者吟味出一些人生道理来。宁恩承的《张伯苓与南开大学》写道：“伯苓先生的嘉言多是深入浅出的俗语，南开学生在校所习的物理、化学、代数、几何，离校几十年后，多已忘了，而伯苓先生的话尚能记忆一二。一九四五年冬，先生七十生日，许多老学生来沙坪坝拜寿，周恩来也来了。我问他南开所学能记得的事是什么？他说伯苓先生在修身班中所说的一句话。在困难犹豫中要顶住，‘要光着屁股由床上跳起来’。他说他在遭遇困难时，就想起校长这句话，就咬牙顶住。”这是借用北方冬天寒冷，宿舍无火，学生贪恋被窝，需要精神上决断起床来作比喻的。但它透露了校长对学生训话，口吻亲若父子的气氛，又揭示了“圣道本乎寻常，至理不外日用”的道理。

近代文化名流沉浸于中西学海，颇有一些学富五车的通人和奇才。他们即便以文字为戏，也多见风骨性情。章太炎生性高傲，不愿作阿谀逢迎文字，有达官贵人求为祝寿文字，他反借此骂人，弄得求者哭笑不得。有一王姓暴发户出以高价，托人说情求书，乃书一联云：“一二三四五六七；孝悌忠信礼义廉。”此暴发户洋洋得意，悬于高堂，却为识者指出，上联为忘八”，下联为“无耻”。这则传闻，使傲骨嶙峋的太炎先生呼之欲出了。又比如陆铤的《永怀于右老，草书慰国魂》，记述有“草圣”美誉的于右任的一个笑话。于在家中宴客，醉后作书，一位

客人已求得一幅，又再要一幅。也许是他感到此人贪得无厌，也许是醉后信笔而书，顺手写了“不可随处小便”六个字，弄得求书者大窘。只好由于右任的秘书长出来打圆场，把这六个字拆下来装裱，重新组装成“小处不可随便”。这也许纯属趣谈，但趣谈中也带几分机智和雅兴，同时也在喜剧气氛的深处暗示了中国文字单音成义，具有卡通式组合的哲学意味和诗学意味。

因此，我觉得这部《百年国土》，既可以为充实的、富有生命感觉的文学史、文化史提供不少难得的材料资源，又可以为人们茶余饭后提供一种遣兴而益智的趣味。近时我写完一篇有关“李杜诗学”的长文，不慎伤足，于随意披阅中免却了我不能下楼之苦。我又想起陶渊明的一句诗来了：“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。”他把奇文与疑义联系起来，是我们读这些有些奇气、饶多感情而难免夹杂偏见的文字时，应该注意的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当你辨明疑义，揣摩到为文者的心态之时，不也是一种理性和悟性的超越吗？

1998年5月25日